

人口学家
访谈

邬沧萍教授谈新形势下的 人口研究与人口老龄问题

本刊记者

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推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的同时,也给人口理论和人口老龄问题研究提出了新问题。记者最近见到了中国当今最负盛名的人口学家和老年学家、身兼多种社会和学术职务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邬沧萍教授。在向这位虽已年逾古稀,但仍在科学园地上辛勤耕耘的学者深深表示敬意的同时,请教了这方面的问题。

记者: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增长上了一个新台阶,计划生育也取得了很大成绩。1992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为12.8%,人口增长率已下降到1.28%,两种生产增长的比例已由改革开放前的大致3:1下降到10:1。如何理解新形势下的两种生产的比例关系?

邬沧萍:研究人的生产同物的生产的比例关系,用二者的增长速度进行对比,固然是相当普遍的使用方法,但也存在着局限性:第一,只能反映增长速度,看不出原来的水平;第二,反映不出二者现在已达到的水平;第三,只反映最终生产成果,不能反映各生产要素,特别是各种自然资源与环境资源同人口之间的关系;第四,不便于进行国内外的横向对比。我认为,考察两种生产是否相适应,较好的尺度还是人均指标。我国人均指标低,首先是由于生产力落后,或者说分子不够大,而作为分母的人口,过多和不断膨胀,无疑是妨碍人均指标提高的一个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如自然资源是不能再生的,有的用一点少一点,但人口多,人均资源就少。还应看到,我国

一些原已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人均耕地、林地、淡水资源等指标,还将因人口的增加而每况愈下,这不能不制约我们的生产发展。可见,我们要达到两种生产相适应,还有很大的差距。

记者: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如果说劳动力能由市场经济来调节,那么,我国人口再生产能否也依靠市场经济来调节?

邬沧萍:当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有人认为,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后,只要经济得到发展,出生率就会自然而然地下降,并出现人口的低增长和零增长。我认为,这种认识是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由市场来调节人口再生产,绝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的和要求。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是从全社会着眼的,而市场机制能调节的只是部分劳动力,并不能直接影响到人口的出生。在科学技术和生产水平日新月异的当代,以现在的市场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来考虑未来20年劳动力数量的需求,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市场最先影响的是人口的流动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培训需求,而不是劳动人口的再生产问题。人口再生产也并不完全受经济因素的制约,社会文化因素、民族风俗和习惯传统对人口再生产仍有较大影响。我国很多地区经济还不够发达,如果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和服务工作跟不上,而任凭这些社会文化因素和传统习惯起作用,人口膨胀也必然会持续一个较长时期。

记者:您是如何关注起老年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前景如何?

邬沧萍:我最早是学经济和工商管理的,1951年从美国回国后,长期在大学从事统计学的教学与研究。1974年起先在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研究室,尔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从事人口学的科研与教学。多年的实践使我深深感到,我国的人口学研究,在学习和借鉴外国对人口数量研究方面的同时,更应当在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为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特别是为改造世界服务。应当将人口研究纳入国家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过程,使之为国家的决策服务。控制人口增长与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研究我国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必须不失时机地、瞻前顾后地研究人口的老龄化。例如,生育率的下降与人口老龄化的关系问题,开展计划生育与老有所养的关系问题等等。老年学是一门源远流长的古老的学问,又是一门在本世纪初才逐步形成的新兴学科。在人类社会已意识到将面临不可避免的人口老化的态势的当代,老年学日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在最近(1993年7月,布达佩斯——编者)的第十五届国际老年学大会上,许多人说老年学是一门“朝阳学科”,是下一世纪最热的科学,这是有道理的。老年学是一门既包括自然科学,又包括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学科,从单学科的研究效果对老年学是有限的。从世界范围看,老年学的研究也已越来越受到重视。1950年国际老年学会刚成立时只有14个国家的代表,114人到会,如今已发展到67个国家,会员据说有2万多。老年学的确具有世界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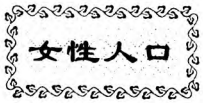
记者: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有何评价?

邬沧萍:我国面临着人口逐渐老化的严峻形势。60岁以上的老人已超过1亿,预计下世纪开始不久很快将达到2亿。本世纪60、70年代高峰期出生的,也就是现在的青年人,到下世纪20、30年代都会变成老人,估计

那时老人最多时能达到或超过4亿。那时5个人中有1个老人,人口老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将更加突出。目前,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加上江苏、浙江两省,60岁以上老人的比例都已超过10%。老人多,人口老化,是由出生率低和寿命延长两个基本因素决定的。老年人的迅速增长并不是低生育率造成的,而是由于低死亡率使人的存活率大大提高造成的。人口老化是社会发展的现象。但是,一个国家将来有4亿老人,可以想象会给社会带来多大多复杂的影响。

记者:根据中国的实际和人口老龄化的特点,您认为应当如何开展中国的老龄工作?

邬沧萍:我们中国所处的历史条件与西方发达国家,也与拉丁美洲都是不同的。我们是低龄老人多,老有所养、老有所为的问题比较突出。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健全,老人的一般温饱问题已经解决。处在我们的情况,在研究基础科学的同时,不重视政策研究、养老问题研究是不行的。在积极寻求的各项对策中,首要的是要使全党、全民明确老龄工作应是我国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我和我的博士生杜鹏1993年6月在《北京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把老龄工作纳入政府职能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文章提出,如果现在不及早把老龄工作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上,则有可能重现我国五、六十年代不抓紧计划生育工作的失误。人口老龄化出现的前提条件是:工业化、城市化、生产的社会化和商品化、人口再生产的现代化,即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必然出现家庭的小型化和核心化,老年人口的高龄化和家庭成员的迁移和流动等。这一系列合乎发展规律现象的出现,必然动摇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老年人的各种需求必须求助于社会来解决;另一方面,生产的现代化和市场的竞争又会使绝大多数老年人沦为弱者。在这种条件下,人口已经老化了的国家为了社会的安定和世代交替的顺利进行,政府



北京城市妇女地位调查研究

冯立天 陈再华

妇女地位问题,不仅是人口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当今中外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和国际组织关注的热点。妇女的实际地位如何,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测定社会进步程度和尊重人权状况的综合标尺。妇女地位,一般是指相对于男子而言,她们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所扮演性别角色的平等程度。妇女地位通常包括妇女的政治地位、法律地位、经济地位、劳动地位、教育地位、社会参与、健康地位以及妇女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的地位等八个方面。在许多国家里,政府都要颁布和执行有关妇女地位的法律(或不成文法)、法规和条例,明文规定男女在政治、经济、劳动、法律等领域享有同样的权利。当然,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法律或宣言上的平等,而要考察实际地位状况。本文主要采取性别对比方法,利用北京1991年婚姻家庭抽样调查所得到的数据,对北京市8个城近郊区中具有北京居民户口的已婚妇女及其丈夫,从妇女的经济地位、劳动地位、教育地位、社会参与、健康地位和婚姻家庭地位等六个方面,分析北京城市妇女地位状况,并构建妇女地位综合值,进行定量评价。

一、北京城市妇女经济地位分析

妇女的经济地位,是指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经济活动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种独立性和自主性,除个别依赖于丰厚的遗产继承或赠予外,基本上取决于妇女自身是否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及其与丈夫收入的差别程度。经济收入越高妇女就能在经济生活中处于完全独立的地位,就有权自主支配经济的支出,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在家庭中,如果丈夫与妻子的经济收入不存在较大的差异,妻子往往在家庭经济活动中处于与丈夫平等的位置,也无从产生依赖丈夫的意识。妇女经济地位上的平等还直接影响到妇女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其他方面的位置,可以说,妇女的经济地位是构成妇女地位的物质基础。附表1是北京婚姻家庭调查中妻子与丈夫平均月收入情况。

从附表1可以看出,夫妻各自的平均月收入存在一定的差异。“妻子”平均月收入在150—199元档次的比例最高;“丈夫”则在200—249元档次的比例最高。在较高收入档次,“妻子”所

把老龄工作作为自己政府的一种职能就是不可避免的。这在世界许多国家是一种共同的经验,对我国来说,由于老年社会保障制度需要不断完善和计划生育政策对养老制度的深远影响等原因,政府加强老龄工作的职能就显得更为迫切。

邬教授这些充满智慧、科学的见解,他的渊博的学识、儒雅的谈吐深深打动了记者。莫道桑榆晚,胜似二月春。我们祝愿这位不知疲倦、充满青春活力的老人在未来的岁月里在人口学和老年学的科学研究上不断攀登新的高峰,取得更多更新的成就!